

中国历史五大盛世

主编 李治亭
副主编 孙玉良



唐开元盛世

黄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唐开元盛

黄中业 著



出版社



3 0010 0235 5

内 容 提 示

该书介绍了从隋末大乱到大唐建国后 200 余年间,社会由大乱走向大治、达到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过程。书中对开元年间的特点作了充分的研究,总结了盛世产生的条件、特征、必然具备的几种因素,从诸多方面再现了开元盛世的绚丽全貌,对于历史研究和改革开放,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中国历史五大盛世

主编:李治亭 副主编:孙玉良

唐开元盛世

黄中业 著 责任编辑 张继红 张 黛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3.5 314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 000

ISBN7-215-04096-8/K·599 定价:18.00 元

中国历史五大盛世

主編

李治亭

副主編

孙玉良



总

序

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行程中，曾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，史称“盛世”。诸如西汉“文景之治”发展到武帝而极盛、唐代“贞观之治”而至开元盛世、明代“永宣之治”称盛与清代“康雍乾盛世”等。这四个盛世一向为史家所称颂。但为史家所忽视的是战国时期，因其七雄争霸，攻伐不已，大多误为无盛世可言。其实不然，战国以独特的方式，突出地显示了盛世的丰富内涵，故合上述四个盛世，组成本书《中国历史五大盛世》，展示中国封建社会曾有过的辉煌。

中国封建社会史仿佛是由历代王朝衔接起来的一道盘旋曲折的长链。一代之兴，一朝之亡，不断更迭；一治一乱，由大乱向大治，盛极而衰，乱极而治，交替运行。有时，某一个阶段闪闪发光，夺目四射；有时暗淡失色，昏天黑地。它们把自己的光明或黑暗永远地留在了历史的巨大时空之中。当其闪现出历史的光辉之时，盛世已经到来；当其黑暗笼罩之时，经济濒于崩溃，社会秩序大乱，甚至战火纷飞，这

就是史称“乱世”。盛世与乱世，恰成鲜明对照。

本书所列五个盛世，各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。它们的出现，都具有相同或相近似的历史背景。一般来说，皆承前代大乱之后，在新兴王朝的上升时期推进至盛世。西汉在秦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，历 170 余年“休养生息”才达到全盛。唐代开元盛世，是在隋末天下大乱之后，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。其间，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才达到这一光辉的顶点。明，削平群雄，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，一统天下，经三代人半个世纪励精图治，较快地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——“永宣之治”。自神宗万历中期，天下乱象环生，经熹宗，至崇祯，终于酿成大乱而不可收拾，到清军入关前，全国已持续乱了半个世纪左右。清人入中原，剿灭李自成与张献忠两支强大的农民军。扫荡南明势力，又花费了近 20 年的时间，实际是乱了近 20 年。明末之乱持续时间相当长，清就是在明末长期大乱的基础上再建的一代王朝。又经过近 70 年的岁月，终由大乱转为大治。战国与此稍有不同，表面看，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，实际上是经过春秋“礼崩乐坏”、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，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，最后由强秦而统一为一国，可以认为，始达到大治的顶峰。

各个盛世都是从大乱走向大治的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，而达到大治后，能保持繁荣而稳定一个时期，直至衰落，同样是一个长短不一的历史过程。可见，盛世是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。这在一定意义上说，封建社会盛世的屡次出现，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。

各个盛世出现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，前后相差，多则数百年，上千年，少则也有 200 多年。尽管如此，它们却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。概括起来，盛世应具备的条件是：国家统一，经济繁荣，

政局稳定,社会久安,国力(包括军事实力)强大,文化昌盛,等等。这不是标准,不能绝对化,只能从这几个方面大致加以界定。这是从历史实际出发,经过比较而概括出来的盛世内涵。不妨先说战国。按学术界通常说法,春秋战国之交,是奴隶制崩溃、封建社会创立时期。这场伟大的变革,发端于春秋“礼崩乐坏”,孔子视为“乱世”,而我们的看法正好相反,它恰恰表明,旧制度行将崩溃,新制度在孕育中萌发。进入战国时期,^①相继有李悝在魏国、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,随后变法运动风起云涌,席卷各国。至中期后,秦国、韩国、齐国、赵国、燕国都变法而强大起来,尤其是商鞅为秦国变法,更为彻底,使秦国比其他六国更强大。尽管各国变法的程度有别,但最终的结果是,或完全或基本已完成社会制度的变革,即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。仅从社会制度的变革来说,战国已具有盛世的显著特征。

战国时期,社会经济空前繁荣。突出表现在人口猛增。据统计,合七国人口,总数约当2000万左右,应是西周以前人口的倍数^②。其中,楚国人口最多,有兵百万,如按民与兵5:1计算,当有人口500万。魏国有“武士二十万,苍头二十万,奋击二十万,厮徒十万”合计为70万,以同样比例计算,国中人口约当350万上下。秦国、齐国、燕国、赵国、韩国各有兵“数十万”,其人口约在二百万至三四百万之间。城市普遍兴起,人口也迅速增加。有1万户的城市已属常见,也不乏万户以上的城市。齐国都城临淄有居民7万户^③,以每户平均5口之家计之,应为35万人左右。这在当时

① 公元前475~前221年。

② 范文澜:《中国通史》修订版第一编。

③ 《史记·苏秦传》卷六九。

称得上是个少有的大城市。人口的大增,无疑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反映。出于自卫或扩张的需要,各国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,像楚国有军队百万,以今天的标准看,相当于中等以上国家的兵力,是十分可观的。

战国时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、军事等各部门及日常生活得到了广泛的应用,进而发明炼钢术,是社会巨大进步的重要标志。与此相适应,手工业也格外发达,专业制造分工愈见细密;商业空前兴隆,重商趋利,已成为一种时尚;长短途贩运,货物互通有无,穿行于各国之间。如赵都邯郸、齐都临淄、魏之大梁(开封)及周室之都洛阳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商业城市。《史记》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战国经济繁荣、社会生活富裕的景象:魏国“人民之众,车马之多,日夜行不绝,辘轳殷殷,若有三军之人。”齐都临淄“甚富而实,其民无不吹竽鼓瑟,弹琴击筑,斗鸡走狗,六博蹋鞠者。临淄之涂,车毂击,人肩摩,连衽成帷,举袂成幕,挥汗成雨,家殷人足,趾高气扬。”齐国“粟如丘山”,粮食多到如山丘。其他各国的粮食也很丰足,多有储积,够国内数十万、上百万军队支用几年,甚至10年^①!这些描写,不无夸张的色彩,但确实反映了战国经济繁荣的盛况。

战国时的学术与文化,尤其展示了盛世的一派辉煌。自春秋以来,各种学说纷出,逐渐形成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道家等诸子百家争鸣的空前局面。这些怀有专门知识的“士”,即知识分子,自由地探讨他们对天——自然界,对人世间及人的思维方式的新认识,自由地表达学术见解,提出一系列治国主张和救世方案。他们或招收学生传授其学说,或自由地到各国传播他们各自的主张,或整理典籍,潜心著述。各国的国君广招天下贤士,出巨资“养士”。像齐

^① 《苏秦列传》卷六九。

宣王招来大批学者,达千百人,自由讲学,形成“稷下学派”,以聚居都城稷门^①外而得名。该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。其他如齐国孟尝君、赵国平原君、楚国春申君、魏国信陵君等王孙贵族都以“养士”而闻名。战国真正开创了一代学术文化空前繁盛的辉煌时代:学派并立,百家自由争鸣;学术巨人纷出,成就震古撼今,如群星辉映,流光溢彩,堪与日月同辉!战国称得上是一个学术与思想开放的社会。战国的学术与文化,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。从一定意义上说,春秋至战国文化与学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。秦汉以后千百年来,学术与文化的演变,无不与春秋战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。它对后世的影响,直到当代仍在继续。

战国不愧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代。它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,早已把战国之间的刀光剑影淹没在它的光辉之中。至于分裂,尚未统一,不能影响我们对战国盛世的认定。应当指出,战国是远从西周分封而来,经春秋兼并而成七雄。所以,不能视同其后的国家分裂,换言之,秦以前,三代的中国还不能看作是真正的统一,不过是奉夏、商、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。故不能以“分裂”而贬抑战国,恰恰相反,由春秋“万国”而变战国时的七国,正是历史的巨大进步;由七国最终变为一国,成一统天下,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,就是说,正向着进步,向着新的变革发展。而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,是春秋战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,不足为奇。七国在激烈地竞争中努力发展自己,各有发明创造。他们的所有成就和进步,便从整体上构成了当时中国的发展水平,或者说,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整体风貌。显而易见,若以“分裂”这一条来否认战国盛世就不足为据了。

^① 即西门。

把战国做为一代盛世,本书实属首次论证,这里,不得不多说几句,欲知详情,本书之一《战国盛世》自有更为详尽地论述。

以下四代盛世,无须逐一细说,需要强调的是,它们跟战国相比,在主要方面,更具有相同的特征。

秦始皇兼并六国,废分封,行郡县制,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,首次实现了春秋以来所重“大一统”的理论主张。自此以后,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我们判定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原则之一。当然,不能说统一绝对正确,凡分裂皆属罪过。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,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,如农民起义“分裂”了它的统一,就成为必要,应该肯定。分裂迟早重归统一,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大特点。我们要肯定“大一统”,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,更有利于中国历史的发展,更有利于人民的创造。这样,对“大一统”的实践的程度,应是我们认定“盛世”的首要条件。西汉文帝(前179~前157年)、景帝(前156~前141年)至武帝(前140~前87年),计70余年,是开疆拓土的时代。向北,击败匈奴,战争持续半个世纪,将其驱逐至漠北以远。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,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版图;向西即玉门关以西(甘肃敦煌县西),约当今新疆南部,汉时称西域,被绥服而成为汉的疆土;向东,击败卫氏朝鲜,把它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划入汉朝的管辖之下;向南、西南、东南开拓,即今之广东、云南、浙江、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。主要是在武帝时期,建立了远胜秦朝的“大一统”。故称武帝时为极盛。

唐至盛所建“大一统”,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。史家往往言必“汉唐”并称。在西北击败突厥,设安西都护府;在东北,彻底击败高句丽,设安东都护府,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,以辖东北地区。开元极盛,疆域之广大远迈汉时。总之,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

…，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。

明永乐、宣德之时，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，控制了大漠南北；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，归属中央管辖。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，广设卫所，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，以辖各卫所。周边的国家，如安南、暹罗、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。永宣之后，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所控制，与明时战时和，几与明相始终，其疆域又有所缩小。明疆域远迈汉唐之上，其疆域之广，统一之扩大，除元朝，唯有清康乾盛世能比，且又胜过元朝。雍正帝声称：“自古中外一家，幅员极广，未有如我朝者”，“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，东西南朔，声教所被，莫不尊亲。”^①此言尚早，实际上，到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解决了西部准噶尔问题，如青海、新疆南北、西藏地区均完全置于中央的统辖之下。西部疆域已达喀尔巴什湖以东。北部为漠南漠北，行盟旗制，西南已改土归流，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。在东北，黑龙江以北、外兴安岭以南；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，尤其是最南达到南沙群岛，皆隶版图，置行省，命官驻军，真正实现了统一。当时，已有 50 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。所以，清朝的统一实属空前。它发展了“大一统”的理论，而且在实践上也突破了历代“内诸夏外夷狄”的传统做法，从康熙时放弃修长城，这就破除了 2000 年阻隔，使得“中外一家”成为现实，直接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。说康乾盛世把中国封建“大一统”发展到顶峰，是一点也不过分的。

每一代盛世，都在“大一统”的条件下，政治清明，实现了长久的安定，生产得到了稳步的发展，粮食足用，国库充实。汉武帝时，

^①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八三。

“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义安，府库充实。”^① 唐开元、天宝年间，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，“太仓委积，陈腐不可校量。”^② 明永、宣之际，“百姓充实，府藏衍溢”，“上下交足，军民胥裕。”^③ 清康熙时，国家储备更充足，自康熙五十年为始，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，至于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。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 1.4 亿两白银。乾隆时，国家鼎盛，储备雄厚，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，累计达 1.2 亿两白银；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达 1000 万石左右。国库存银最高达近 8000 万两，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。即使打仗，军用浩繁，国库存银少则二一千万两，多则六千余万两。显见，财富之充足，是清以前历代很难达到的！

在经济领域其它部门，如手工业、商业、对外贸易等，各代盛世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繁荣。商业城市的大量涌现，突出地反映了经济繁荣的程度。汉武帝时，长安、洛阳、宛、成都、临淄等都是全国的或地方的大商业城市。唐开元年间，都城长安已是国际性的大都市，雄踞亚洲第一，其它如扬州、广州等也是外贸、内贸并盛的商业大都市；明永宣之际，除了北京、南京，主要是江南地区城镇伴随着商业的发达而兴起，原已发达的苏州、扬州、广州、佛山等更见繁荣；沿运河两岸，又兴起了一批城镇。清康乾之际，其城镇之多，又远远超过了明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边疆地区的城镇，北有恰克图，南有广州、佛山；西有巴里坤至伊犁，以及南疆的喀什诸城，东有盛京（沈阳）、吉林（今吉林市）、齐齐哈尔等大小城镇，都是在开发边疆的过程中兴隆起来的。

① 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卷一一二。

② 《全唐文》卷三八〇。

③ 《明史·食货一》卷一七七。

本书所列五个盛世,除战国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,不能开通对外关系,汉、唐、明的盛世,都是中国向外开放的三个最好的历史时期。汉以通西域而与中亚建立了密切地贸易联系,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,就是那时开通的。盛唐的经济、文化向外开放,向西亚,远至阿拉伯诸国;向南亚诸国,以及近邻日本、朝鲜等国都与唐关系至密,而都城长安已成为亚洲的政治与贸易的中心。更有明永乐时遣发庞大船队,由郑和率领,首航南海,远至非洲海岸,前后七次远航,显示了中国蓬勃前进不已之势。在对外开放方面,清康乾盛世远不如汉唐明三代,它几度实行海禁,不许片板下海,后虽开放四个口岸,已属严格,乾隆时,又将四个口岸减为一个,只剩广州一处;又严格限制西方商人的活动,不得与中国人接触,禁止设教堂,不得在中国传教。当然,它也没有明盛时的气魄,派船出洋。乾隆五十八年,英使马戛尔尼来华,被高宗严拒于中国大门之外。至18世纪,当西方殖民主义四处扩张、向东方踏进时,中国严行闭关政策,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。

五大盛世,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,就是在文化与学术方面,独树一帜,繁荣昌盛,都达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,甚至连后世也难以企及,只能接受它的光辉。战国的文化已如前述。汉武帝之世,对文化的最大建树,即由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,罢黜百家的建议。自此儒家学说为历代所奉行,成了封建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,影响了中国历史二千余年。武帝尊儒,是经过西汉初年行黄老思想,再屡经辩驳、论证而实行的。这一结果,实际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争鸣,经实践检验而得出的最后结论,这里已包含对数百年来思想论战的全面总结。武帝尊儒,无疑开创了儒家思想统治的时代。此一时期,另一个开创,当属以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为代表的史学,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新体例,并成为积历代26史之第一部。

在文学上的独创,是继屈原“骚体”(《楚辞》)之后,创作了赋体文学,称为“汉赋”。其次是乐府歌诗,为五言诗,亦属首创的新体诗。所有这些,已成为后世文学创作汲取营养的源泉之一。盛唐文化,堪称是与春秋战国并争光辉的伟大而辉煌的时代。尽人皆知,唐诗之成就,是中国文学一绝,如李白、杜甫,稍后的白居易,至今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诗人。现存全唐诗 5 万首左右,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。再有散文,也是此时发展起来的新文体。传奇文学独有特色,绘画、雕塑等各有独创。如唐诗、吴道子的绘画等,各树高峰,后世很少有人能达到同一高度。其它还有音乐、舞蹈,流传至今而余音、舞姿不绝。总之,盛唐文化璀璨辉煌,即使 1200 余年后的今天,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光辉。比较而言,明永宣文化远不如盛唐。在其不长的盛世阶段,也并非无所创造。举世皆知的《永乐大典》,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空前规模地系统整理。这部巨制类书,集中了 2100 余名各层次学者,历 3 年而成。它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自有重要地位。除此,成祖还组织学者编纂《明太祖实录》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、《五经四书大全》、《天下郡县志》、《列女传》等史地、论理纲常、阐扬儒家思想的书约 30 多种。时间虽短,成就可观。后人对此评说:“帝(成祖)方内兴礼乐,外怀要荒,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。”^① 可以想见永乐时期文化之盛。

康乾盛世的文化,更显示出超越古人的恢宏气势。文化之盛,发端于顺治朝修《明史》,康熙时,着手整理前代典籍,纂修历史与阐扬理学之书,已初步形成规模,以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、《康熙字典》为代表,所修不下数十种。经雍正至乾隆前期,掀起整理古籍的热潮。高宗以国家进入“全盛”,全面转向“文治”,大兴“礼乐”,其目

^① 《明史·胡俨传》卷一四七。

的正如他借用宋代大儒张载的话说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^①高宗以此为宗旨，组织各方面专业人才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纂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。从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以后，他亲自主持并参与整理典籍、亲撰部分书，不下百余种。但最辉煌的创造就是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开始，成立专门机构，向全国征集图书，进行筛选、鉴别、校勘、编纂，历10年之功，于乾隆四十六年编成。先后参加人员，共4200余人，包括一批优秀学者、博学鸿儒。国家投入的人力、物力与财力之巨，再创一次空前记录。这部巨型丛书，收书3500余种，7.9万余卷。另编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和存目之书，共计1万余种；选精品书，又编成《四库全书荟要》，收入464种。直到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才全部刊出。这场大规模的学术文化活动，持续了20年。《四库全书》及相应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问世，是给“康乾盛世”增添的巨大的光彩，是达于“极盛”的又一标志。在编纂过程中，对清代及清以前历代典籍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总结。所以，《四库全书》等书是对中华传统文化整整的结晶，空前绝后，无与伦比。它对积存与传播传统文化的贡献，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。但也须指出，为编纂这部书，也销毁了不少为清所禁之书；同时，因文字触及禁忌而连兴文字狱，迫害知识分子。这是盛世光辉掩饰下的最黑暗的一页记录！

编纂《四库全书》的另一个积极后果，就是直接促进了著名的“乾嘉学派”的形成。它以考据而著称，它创立的治学方法和已取得的卓越成就，以及众多考据大师的涌现，使它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与学术相辉映，文学艺术异彩纷呈，争奇斗妍，群星

^① 乾隆：《御制文三集》卷一三。

并出,佳作山积,是继唐宋之后又一个文学艺术的高峰。正如举世皆知的《红楼梦》,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就诞生在盛世时期。洪升的《长生殿》、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是盛世戏剧的代表作。诗歌被当代文学家誉为唐宋之后“又一奇峰突起”,其成就“足以超越元明,上追唐宋。”^①高宗一生写诗 41800 首,写诗之多,为古今第一人!其艺术成就不算高,却也不乏佳作。词作以满族纳兰性德为代表,自成一派词风。其它如散文、绘画、书法均有建树。总之盛世时期的文化全面繁荣,代有才人,各领风骚。

文化涵盖面广,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。这里,只提及有代表性的方面,有的同属文化,如教育、科技发明等,各书均有详略阐述,就不逐一论列了。

历史是人创造的。同样,一代盛世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共同创造的。人们不能脱离或超越当时的条件去创造历史。当历史已经准备了客观条件,这时,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就起决定性的作用,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物或称为伟大的人物的主观作用尤其重要。历史唯物主义从来都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,恰恰相反,而是给予充分肯定,恰当地评价。从五代盛世,我们便发现,每一代盛世出现前必有伟大人物出现,成了盛世的“创造者”,他们都具有非凡的才能,博大的胸怀,勇于进取的气魄,坚忍不拔的精神;从个人品质上说,超凡脱俗,与众不同。战国时期,那些改革家、远见卓识的政治家,都属于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人。这是一大批人,他们诞生在各朝各代,靠他们的进取精神,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。西汉文、景两帝为政,史家誉为“文景之治”。武帝继其后,利用先辈的丰富的遗产,把盛世推向极盛。唐太宗雄才大略,开创一代“贞

^① 钱仲联等:《清诗精华录·前言》。

观之治”；武则天承前启后，以超群的勇气和胆识，为“开元盛世”铺平了道路。明太祖、成祖父子勇于创业，为永宣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。圣祖为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，在位 61 年，虽曰“守成”，实同“开创”^①，开疆拓土，开创了盛世的新局面。世宗继续推进，高宗乘父祖之余烈，再把盛世推到辉煌的顶峰。康雍乾盛世是三代人连续奋斗的成果。可见一代盛世之出现，必有一代伟大人物之强有力运作，往往需要几代人不间断的前赴后继，否则，难以为继，即将出现的盛世将被扼杀于形成的过程之中。历史上不乏其例。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，结束了长达近 200 年的分裂，励精图治，以节俭治国，国势蒸蒸日上，国库充盈。岂料其子杨广（即臭名昭著的炀帝），穷奢极欲，仅 10 余年，不仅把可能出现的另一个盛世摧残已尽，而且把父亲创下的基业也一同葬送掉。明万历初，名相张居正改革，国势大振。岂料张居正一去世，神宗亲政，一反改革善政，形势急转直下。他倒行逆施，把明朝引向衰亡。故史家论明亡，实亡于神宗^②。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，盛世需要一代或几代明君，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伟大人物，他们的历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。

以上所论盛世的基本特征，并非说每一代盛世皆尽善尽美，我们只能从整体同各个历史时期相比较加以确定。事实上，五个盛世达到的水平并不完全相同，总因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及认识能力的局限，每代盛世或多或少都有其缺欠。但总是后来居上，后代超越前代，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。这就是说，后来的盛世总比前代盛世增加新内容、新光彩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，此为必然之

① 《清世宗实录》卷一。

② 《明史·神宗本纪》卷二一。